

学术书架



《尚書學史》，程元敏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280.00元

以七十八岁高龄（2008年）出版一百二十万字《尚書學史》的程元敏教授，是我最为心仪与尊敬的前辈学者之一。其治学重资料、明本末，每撰一文、著一书，都能将相关史料竭泽而渔，少所遗漏。这一笃实学风自其撰博士论文《三经新义辑考》时已如是，之后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三国蜀经学》《书序通考》《诗序新考》及数十篇论文无不如是，至这部煌煌巨著《尚書學史》，更将全面占有资料、言必有据的踏实学风体现得淋漓尽致。

儒家经典，经过二千多年的流传和无数精英的钻研，版本文字之歧出，诠释经义之歧见，传授源流之歧异，交互纠葛，早已使后世张皇失措，望而生畏。因而不仅需要通贯的经学史论著，也需要有翔实的专经专史，既为学术史做总结，也为后学作津梁。作为中国最早的政典

《尚書學史》：专史研究的空前杰作

虞万里

《尚書》，文字古奥，加之有今古文真伪之辨，复经三百年来几十位学者用数百万字的篇幅往复辩难争论，更需要有一部专史来作梳理。二十世纪后半叶，曾经出现过几本各有特色的《尚書》学专著。依出版年分论：先是陈梦家的《尚書通论》，分专题抒心得，续后又有增补。蒋善国《尚書综述》继之，亦分专题，却主要是综述各家观点，翔实清晰，偶有独到，加案语于后。刘起■潜心《尚書》数十年，其《尚書學史》虽上起先秦，下贯现代，但以专题，或以时代，或以人物，或以书篇先后论述，主要是阐发一己的观点，故稍嫌条理，不如他另一本《日本的尚書学与其文献》专就写本而论来得清晰。断代的尚書学，先有古国顺的《清代尚書学》，以人物贯串《尚書》研究史，因清代是《古文尚書》辨伪最激烈的时代，所以侧重于正反真伪两派的梳理。蔡根祥《宋代尚書学》，则以学案派系人物之方法，谱写宋代尚書学。马书远《周秦尚書学研究》从出土文献、传世文本和书学流变、书学诠释诸方面展开研究。马书与程先生《尚書學史》同年出版，此后尚有两三种《尚書》学专书出版。

先生有鉴于先出版的专史多以专题讨论为主，侧重于先秦典籍引述《尚書》和今古文辨伪等，“于历代《尚書》学沿革，《尚書》说之于政教，《尚書》学者之撰有专书或仅有相关言论散见于史文篇之尚書学者等事，多阙略未及”，乃另辟蹊径，自成系统，约而论之，可分四点简述：

一、对《尚書》原典的考释分类研究。考释原典，首先要回答《汉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書》”是否符合实际。《尚書》有很多记事之文，如何解释。作者分析《尚書》篇章、先秦史职，综合前贤成说，论定《尚書》为政令之书，专记君臣《尚書综述》继之，亦分专题，却主要是综述各家观点，翔实清晰，偶有独到，加案语于后。刘起■潜心《尚書》数十年，其《尚書學史》虽上起先秦，下贯现代，但以专题，或以时代，或以人物，或以书篇先后论述，主要是阐发一己的观点，故稍嫌条理，不如他另一本《日本的尚書学与其文献》专就写本而论来得清晰。断代的尚書学，先有古国顺的《清代尚書学》，以人物贯串《尚書》研究史，因清代是《古文尚書》辨伪最激烈的时代，所以侧重于正反真伪两派的梳理。蔡根祥《宋代尚書学》，则以学案派系人物之方法，谱写宋代尚書学。马书远《周秦尚書学研究》从出土文献、传世文本和书学流变、书学诠释诸方面展开研究。马书与程先生《尚書學史》同年出版，此后尚有两三种《尚書》学专书出版。

先生有鉴于先出版的专史多以专题讨论为主，侧重于先秦典籍引述《尚書》和今古文辨伪等，“于历代《尚書》学沿革，《尚書》说之于政教，《尚書》学者之撰有专书或仅有相关言论散见于史文篇之尚書学者等事，多阙略未及”，乃另辟蹊径，自成系统，约而论之，可分四点简述：

史与思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清华国学院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30.00元

作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全球化”这一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探讨兴起于上世纪末叶。近期出版的《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在“全球化”的问题思潮中，展现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独到思考。此书由清华大学国学院主编，汇集了现今清华国学院五位教授的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围绕“全球化”这一共同主题，集中展现了清华国学院“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的学术宗旨。并且，由于这几位作者的学科视角有别，关注的重心也不尽相同，这几篇文章收编统一起来，恰可组成一个从古到今、由里向外的知识系统，可为那些对全球化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广泛的认知平台。

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

在这五篇文章中，刘东教授和

我们从未自外于世界？

叶树勋

陈来教授主要关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文化所能发挥的作用。刘教授的文章是一篇导论性的论文。针对目前日渐兴起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有些学者只是关注其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也不乏学者一味强调这一趋势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作者在文中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国内外学者的各方论调，并指出，对“文化全球化”持纯粹乐观主义的态度和那种悲观的看法一样，都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处于文化全球化方生方成并且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事情，既接受这一进程的代价，同时更要发挥本土文化的优势，在世界潮流中与时俱进，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化解这一趋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争取下一阶段“后福”。

那么，在文化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国文化究竟可以扮演何种角色，能够做出什么贡献？不少国外学者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西方文化中的理念才具有普遍价值，而东方文化只能是一种特殊主义。针对这样的论调，陈来教授在其文章中予以了回应，认为这种全球化观念实质上是一种“西方化”的狭隘主张，东西方的文化虽然互有差异，但都具有可普遍化的价值，西方的文化理念可普遍化，而东方世界的文化理念同样也具有普遍性。

陈来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一势”分析框架，指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趋势里，我们既不能脱

离现实而空谈理想和正义，同时也不能忽视我们对历史的能动参与和引导作用，妥当的态度应该是，经由全球化之“势”探寻背后之“理”，与此同时又以其“理”引导全球化之“势”。自近代以来，全球化一直处于不合理的从属结构，我们应当重新发掘东方世界所蕴含的力量，去积极参与乃至引导今日的全球化趋势，改造当下文化全球化的不合理结构。作者强调，只有建立起“多元普遍性”的观念，才能使全球所有文化形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独有的力量和贡献，从而走向一种合理化的“全球化”。

二、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围绕文化全球化这一话题，刘、陈两位教授为我们展示了其间的复杂情况及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而刘迎胜、李伯重两位教授的文章则是从全球史的大视野考察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历程。刘教授的论文主要讲述宋元以前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史，而李教授的文章在时代上恰好接续了刘教授的文章，将关注点放在了明清以降中国与外部的交往关系。

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将“全球化”的开端回溯到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自此往后，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走向日益一体化的格局。然而，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人类的跨地区交往并非始于近

代，那么在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世界有着什么样的交往和互动呢？刘迎胜教授的文章正是带领我们走向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一种向导。作者指出，早在史前时期中国已经和周边世界乃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交往和联系。但这一时期并没有当时文字的记载，怎么办？作者调用了人种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几种学科方法，并且结合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对这段无文字记载的“幽暗时代”展开了材料所能及的切实考察。接下来，作者逐期介绍了古代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往过程，不仅考察了中国方面的史料，而且也通过当时西方文献关于古代中国的记载证实了不同时期里中国和外界的互动交流。

李伯重教授的论文则重在关注明清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当中的历史贡献。关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这几百年间中国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而我们的经济也一直是停滞不前乃至不断衰落。对此，李教授在其文章中给予了有理有据的修正。作者指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亚洲的海上贸易已有了长久的历史，而在这张贸易网里中国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该书第五节还专门探讨华基督教出版机构的兴衰和运行机制，并将文字事工的命运与时代变迁和华基督教发展特征紧密结合，这是以往同类著述研究的薄弱之处。就图书发行机构而言，作者分时段介绍了广学会、圣经公会、华英书局、圣教书会等重要基督教出版机构在华西的发展进程，并辅助以大量的图表和照片，填补了学界对近代基督教出版机构在华西状况研究的空白。该书第五节还专门探讨华基督教出版机构的策划手段、发行促销方式、作者读者群、资金来源等，既有基督教文字事工的主体，又有制度上的运行机制，展现出一幅动态的基督教文字事工的运作图景。

这部著作的另一大特点，是它注重揭示华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地域性特征。作者认识到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基督教出版机构不可能脱离当地的民族环境。当时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

字，传教士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配合下，成功研制出苗文、傣文、景颇文、佤文、拉祜文、彝文等文字，对于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传教士还将《圣经》翻译成各种文字放教于各地，对于基督教在华西地区的植根和少数民族知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华西很多基督教出版物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以《华西教会新闻》为代表的一批期刊，深受地域文化的浸淫，关注当地问题，反映华西社会状况，是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抗战时期，成都成为全国基督教文字事工的中心，肩负起为大后方教会提供文字作品的重任，其转折与演变的历程值得关注。该时期华西基督教出版物大都持维护民族独立、反法西斯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在宣传抗战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书中不乏独到见解。作者指出，华基督教文字事工与世俗出

版业相比效果有限，且自身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但它对华西社会的文化建构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尤其深远。对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文字创作，不能简单地斥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从客观效果上看，华基督教文字事工为西方文化在华西地区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

近代基督教教会所造文献卷帙浩繁，价值巨大，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介绍、编目、编纂等基础性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陈建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此，《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一书只是其远景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作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出版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陈教授将趁热打铁，再接再厉，联合学界同仁继续整理全国基督教文字事工文献，并开展规模宏大的研究。可以预言，此系列著作的问世必将大大推进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徐炳三

华西基督教文献资料的开拓之作

徐炳三

献数量十分庞大，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基本信息尚不为人知，利用率非常有限。陈建明教授新近推出的《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一书，正是这一领域的开拓之作。

这部五十余万言的巨著，系统梳理了近代基督教新教华西文字事工的基本状况，通过考察华西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目的、兴起与发展，出版机构的建立与运作，出版物的内容和发行模式，全面分析了华西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问题、特点与社会影响。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时间为纲，以1912年和1937年为节点，将华西基督教文字事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详述每个阶段的文字事工的情况和特征；下编重点探讨华西文字事工的地域性特征、运作方式、问题与影响。

这部著作在史实建构方面相当成功。作者地毯式地搜集了海内外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及地方文史

部门所藏的大批原始文献，其史料基础非常坚实。这些资料中，作者除详尽爬梳了《教务杂志》、《中华基督教年鉴》、《差会年鉴》、《中华归主》等重要的基督教基本史料外，还挖掘了许多华西地区的特色史料，其中相当一部分很少被人利用，乃至有些完全不为学界所知。比如存在于华西四十余年的英文报刊《华西教会新闻》，以卷帙浩繁和内容丰富著称，是研究近代华基督教史和西方传教士在华西的重要文献之一，堪与《教务杂志》相提并论，但学界对前者使用率与后者不可同日而语。作者将所搜集的文献考镜源流、甄别比较，最终清晰地架构起华西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发展脉络，其系统性和完整性远超过以往的相关研究。该书对近代华西教会主要的出版物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有助于学界对这些资料的开发和利用。

该书并非仅仅关注基督教出版物本身，而是用大量篇幅介绍

华基督教出版机构的兴衰和运行机制，并将文字事工的命运与时代变迁和华基督教发展特征紧密结合，这是以往同类著述研究的薄弱之处。就图书发行机构而言，作者分时段介绍了广学会、圣经公会、华英书局、圣教书会等重要基督教出版机构在华西的发展进程，并辅助以大量的图表和照片，填补了学界对近代基督教出版机构在华西状况研究的空白。该书第五节还专门探讨华基督教出版机构的策划手段、发行促销方式、作者读者群、资金来源等，既有基督教文字事工的主体，又有制度上的运行机制，展现出一幅动态的基督教文字事工的运作图景。

这部著作的另一大特点，是它注重揭示华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地域性特征。作者认识到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基督教出版机构不可能脱离当地的民族环境。当时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

字，传教士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配合下，成功研制出苗文、傣文、景颇文、佤文、拉祜文、彝文等文字，对于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传教士还将《圣经》翻译成各种文字放教于各地，对于基督教在华西地区的植根和少数民族知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华西很多基督教出版物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以《华西教会新闻》为代表的一批期刊，深受地域文化的浸淫，关注当地问题，反映华西社会状况，是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抗战时期，成都成为全国基督教文字事工的中心，肩负起为大后方教会提供文字作品的重任，其转折与演变的历程值得关注。该时期华西基督教出版物大都持维护民族独立、反法西斯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在宣传抗战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书中不乏独到见解。作者指出，华基督教文字事工与世俗出

版业相比效果有限，且自身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但它对华西社会的文化建构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尤其深远。对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文字创作，不能简单地斥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从客观效果上看，华基督教文字事工为西方文化在华西地区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

近代基督教教会所造文献卷帙浩繁，价值巨大，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介绍、编目、编纂等基础性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陈建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此，《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一书只是其远景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作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出版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陈教授将趁热打铁，再接再厉，联合学界同仁继续整理全国基督教文字事工文献，并开展规模宏大的研究。可以预言，此系列著作的问世必将大大推进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